



六四特輯

六四二十周年

今年的母親節很特別，距離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只有兩天。5月12日但見國家有悼念默哀的儀式場面，卻無善後安排還死難者家屬真相和公道，因人禍天災失去孩子的母親眼淚未曾抹乾。而另一批母親更甚至不能公開表達她們喪子的哀痛！已經抗爭了二十年的天安門母親今年2月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發出公開信，只是卑微地要求政府「拿出勇氣，衝破禁區，直面六四」。每年6月前後，在香港大小堂會的主日崇拜中慶幸仍能聽到信徒為這些堅強的母親遙遠祝禱。本期專訪了不同年代的信徒，分享他們的六四回憶；也嘗試從神學角度反思，在不放棄要求平反六四的訴求下，探討如何發掘信仰資源，超越二十年如一日的政治口號，令教會在國家實現公義和解的艱難過程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陳一諤4月初在校內一個論壇上的六四言論惹起公憤，最後被罷免下台。不少人因此憂慮歷史修正主義(historical revisionism)抬頭，六四回憶會否後繼無人？我們先從年輕一代談薪火相傳，再由上一代回顧他們的努力和分享對現況的觀感，並藉以向他們致敬。

記念六四 • 薪火相傳

對年輕人要有信心

2000年六四的十一周年，有一名年輕信徒在頭髮上剃出「64」的字樣，他就是喜歡被稱為「阿公」的任承恩。阿公現在是突破國際培訓部部分時間同工，1989年他九歲：「我記得父母很緊張地看著電視；我記得外面橫風橫雨，我記得那時無卡通片睇，全都變了新聞；我記得沉重而哀傷的感覺。再大一點，到六年級，才

多了一些理性及factual的印象。」阿公稱自己屬於「八十後」的一代人裡面，對六四最有意識的最後一群人：「嚴格來說，即使我有親身的印象，那種感覺是很矇矓的。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不同之處，如果你在六四時已是成年人，你已是大學生成，或已出來社會做事，你的印象是一個成年人的印象，當時你很清楚發生甚麼事。所以，當你現在看見有些人在『亂噏廿四』或說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時，你會很憤慨，因為你是第一人稱、第一時間的目擊證人。我就未必是這個level，某程度上，我是有第一手印象及感覺，但那印

本期內容提要

- 記念六四 • 薪火相傳
- 神學反思

頁1-5

頁5-12

象很模糊，然後是鎖起數年以後，直至大學時才爆發，再去了解當時發生了甚麼事。」

身處兩代人之間，阿公有一種「刻不容緩」的使命感，要將六四的回憶承傳下去：「我想向現在仍不忘六四的成年人講，不要太怪責這一代的年青人。我們首先要真誠地接納他們真的不知道，如果你開始就覺得他們沒理由不知道，甚至惱了他們，那就無法溝通！如果我們只是不停堅持用上一代的文化，要求年青一代去跟從，某程度像是把新酒裝進舊皮袋裡，doesn't work！……年青人會『受、buy』，不要少看這一代的年青人，他們不是蠢。甚至我見他們不是不熱心，只不過他們的熱心很快就被消磨了。我們要真心相信年青人是好的，只要我們把不好的方面抹走，讓他們美好的本性顯現就是了。」成年人要對年青人寬容，因為他們犯錯，成年人也難辭其咎。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風采中學副校長何漢權，也是一位資深的歷史科老師，他認為學校有責任教育下一代關於六四的史實：「學校作為一個培育場所，我們提到德育及公民教育，所以要有價值觀的堅持。你問學校是否應該是探討六四的一個重要地方，以及身為教師是否應該有一個責任，把這故事說下去，我覺得是需要的。」但同時，何漢權承認學校也有他們的限制：「礙於每一間學校，校長是否認為六四故事很重要，老師是否覺得重要，尤其是年輕老師，他們自己都不認識，怎樣去講？還是覺得多一個人入大學，或公開考試成績更重要？……六四不用考，也無得考，認識六四不會加分嘛！所以我們

要問，學校教育的作用和意義在哪？不論是中學或大學，到最終是學做人。」

雖然在學校裡面講六四或會吃力不討好，但不少老師仍願付出。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的朱蓓蕾老師，近三、四年開始負責公民教育組，身為中國歷史科老師，她深感自己有責任讓學生認知六四。朱老師說，學校近十多年來都有舉辦大小不同的六四教育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及文章閱讀等。去年則向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借用二十多個「易拉架」在校內築起「展板牆」，展覽為期四週。不過，吸引到的不是學生，反而週六、日來堂區望彌撒的教友及坊眾不少駐足觀看。

在學校介紹六四民運的資料，合適的切入點亦十分重要。朱老師分享她其中一次失敗的經驗。三年前，她為了豐富學生認識六四民運的資訊，從同事借來當日錄映的民運新聞片段於午飯時間播放給中一學生觀看。可是，由於那些電視片段未經剪輯，部分內容冗長而重複，未能吸引學生留心觀看，失去教學的效能。

這些經驗雖然令朱老師有點灰心，不過她亦從中汲取教訓，並且獲得校長和同組老師的支持，所以朱老師說，她仍然無悔地繼續這一份極有意義的國民教育工作。況且，也不是所有學生對六四的歷史影像都無動於衷，一位中一同學去年參加講座和觀看紀錄片後寫下這則感受：

我看見示威者只想官方與他們對話，但他們沒有理會示威者，還出[動]軍[隊]鎮壓他們。眼見示威者一個接一個被軍方屠殺，令

我十分心痛。再看見年齡最少的受害者只有九歲，但身上就有九個子彈孔，令我憤怒起來。看見天安門廣場到處都是屍體，不少受傷的示威者都盡力奔跑離現場。這些示威者真是可憐。

基督徒與愛國民主運動

從一開始，基督徒就已經投入支持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不少人更是前線的尖兵。五分之一世紀過去了，這些義無反顧的前輩都已經成為「老兵」，但他們仍然屹立在守望台上為國家的未來吹起號角。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華叔)1974年在尖沙咀浸信會受浸加入教會，卻較少以信徒身份接受訪問，他解釋：「有一次到學校演講，有老師問及：『為甚麼你是一個這樣低調的基督徒？』我就答：『基督徒沒有甚麼低調與高調。』每一個人社會上有他自己的工作崗位，選自己所長去參與社會，而宗教活動非我所長。我只按照神的要求，盡了自己的責任，所謂：『向自己負責，向神負責。』」其實，華叔過去幾年都有接受基督教善樂堂林國璋牧師的邀請，在六四臨近的主日證道。

華叔形容基督徒的社會參與是一種「靈修」，而爭取平反六四更是他畢生的志業。對於能否親眼見到平反六四，華叔坦言他的態度是：「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華叔分享做人的三個座右銘：「第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第二，有容乃大，無欲則剛；最後，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他不期望社會上所有人都關心六四，也不責怪冷漠的人，但他說：「我認識一對夫婦，就是因為當年在集會上認識、拍拖，然後結婚。生了

小孩後，他們年年都抱著小孩參加燭光集會。除了是紀念倆人結識外，亦是對這件歷史事件有感情。」1989年後出生的年輕人仍有很多認識六四的機會途徑，無論六四何時平反，總會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被問到假如平反六四後，他會怎樣，一貫嚴肅的華叔露出燦爛的笑容：「嘩，我呢！首先一定會慶祝吓，這麼多年來的願望終於能夠實現。但我認為仍然要有紀念活動，因為六四平反了，不代表中國許多問題可以解決。我們支聯會五個口號就是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最後是建設民主中國。建設民主中國，即使平反了六四，這條路還是相當長！還須努力！」

據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盧龍光牧師，最近在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刊物《基關窗》的「六四·二十年專輯」中的憶述，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愛民會)可能與支聯會同時同地於1989年5月20日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址開會後誕生。愛民會後來正式在紅館舉行過一次成立典禮和萬人祈禱會，至今它仍是支聯會的團體成員之一。愛民會執委、中華基督教會九龍合一堂主任牧師胡丙杰牧師也記得：「當時主要有蔡元雲醫生、朱耀明牧師、盧龍光牧師及郭乃弘牧師等，他們都是我們的長輩，覺得應有基督徒本身的看法及做法，因此希望能夠從基督徒的角度與立場，組織一個『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讓香港基督徒關心祖國的民主運動，及北京學生運動，而我們希望融入更多基督教的信念及精神。」

胡丙杰牧師說，愛民會和支聯會最初

幾年有很多合作機會，「譬如支聯會搞遊行，我們就不會自己再搞，而是鼓勵信徒參加。又如六四燭光晚會，我們亦鼓勵成員參與悼念。但在此之前，我們必定會舉行祈禱會，多數於遊行及六四前。祈禱會有時亦會邀請其他基督教團體，近一、兩年更邀約天主教團體。」胡牧師承認，民運反思祈禱會出席人數一年比一年少，而且每年6月4日於《明報》刊登的基督徒聯署禱文的簽名人數曾經少到只佔四分一頁的版面，但他們仍然會繼續做。胡牧師分享，即使在他已經服事了31年的堂會，參與六四相關活動的會友「來來去去也是那三、四十人，而我們有三百多人聚會。」身為牧者，他最渴望看見會眾屬靈生命成長：「我在不同場合不斷提醒他們，基督徒一定要記得彌迦書六章8節：行公義，好憐憫。這是我自己很堅持的原則，希望提醒弟兄姊妹做人處事都有這個方向……除了靈性成長外，在這層面亦要有成長，對社會公義，對大是大非，對愛國，對民主，要慢慢培育及引領他們。」談到愛民會繼續存在的價值，胡牧師感嘆香港人(包括一些基督徒)「很犀利」、「很識做」：「我覺得隨著歲月，人總會改變的。那種改變可以來自幾方面，個人工作環境轉變，以至時間運用亦改變了；加上這漫長歲月，思維亦會慢慢淡化。當然，部分是由於消極了，好像半放棄般，搞來搞去也沒甚麼可做，都是不能夠平反，『無心機』，於是就不再參與其中了。」但他堅信：「上帝一定會帶領我們，六四一定會平反，我們要忍耐，要一顆恆久忍耐的心，畢竟這真是一件不公義的事。至於時間，實在沒有人會知道。」

愛民會另一執委、「我要回家運動」主席、柴灣浸信會主任牧師朱耀明牧師(朱牧)，外界普遍稱他為營救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的總設計師之一，是一個「非一般」的牧師。計劃於明年1月退休的朱牧笑說，當日很多事情暫時還不能披露，但他有意在適當時機將那段不平凡的經歷寫出來，存留後世。朱牧從不覺得自己做了甚麼不符合牧者身份的事情：「當睇到有人嘍水深火熱，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是叫喊，同埋扶佢一把，唔會睇住佢沒頂，會即時救咗佢。」逃亡民運人士落寞的神色深刻烙印在朱牧的腦海之中，他說：「有生之年，唯一的心願，係佢哋可以有尊嚴地自由回國。香港由始至終只能扮演支援的角色，爭取平反首先就是讓流亡人士回家探親。我從不考慮係咪困難，該做嘅就去做。」

朱牧1974年已經在柴浸服事，跟會友一同成長：「大家都接受了朱耀明就係咁嘅人」，所以沒有甚麼壓力；反而他回憶起1989-91年期間，回歸迫在眉睫，很快很多人已經退縮，在香港教會和社會裡面有一種低氣壓。朱牧說香港最早期很多教會的社會服務、學校、禮拜堂不可分割，教會在殖民地時代是政府的夥伴，但回歸後教會給社會的印象是依附政府：「教會要像耶穌一樣，呼籲人悔改認罪。教會不需要政府認同、不需依賴政府，不必懼怕權勢，就能夠講公道說話，喝止政府做傷害人民的事，讓國家返回正途，挽救人於危難之中，制止災禍來臨。」對朱牧來說，「講真話」是教會的使命：「係自由社會也不講，就係懦弱，亦不符合信仰。自由嘅可貴唔係我單單享受我嘅自由，係我維護別人嘅自由，可以代你發聲。」

不少香港人對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抱有厚望，但朱牧說，他分不清國家是開放了、還是後退了，過去的發展證明，例如在報禁、黨禁、反貪腐等方面毫無寸進，利益集團勢力太大，問題的癥結是制度。「香港的群眾運動當初也不是針對個別領導人，我記得5月20日，第一個叫『李鵬下台』的是程介南！」朱牧同華叔一樣相信，平反六四與中國的民主建設是二而一的，且將是漫長而痛苦的奮鬥過程。

神學反思

一般人或有很多不必記起六四的理由，例如不能抵受傷口長久不能癒合的創痛；連受害者家屬為了擺脫仇恨和憤怒的枷鎖，有時或者也很想忘記。基督徒也會有想放下心理包袱的情緒反應，所以我們應該體諒別人的軟弱，但基督徒確實沒有逃避回憶苦難的藉口。

不想回憶，未敢忘記

哲學上有所謂「記憶的倫理義務」，應用於最少兩種情況：(一)文明社會有責任紀念嚴重違反人道的罪行(gross crime against humanity)，記取歷史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親歷六四的這一代有責任不讓下一代忘記；(二)對於我們的親友，或與我們有特殊關係的人(例如同工、同胞)，我們自然有需要記念他們，因為記憶正是關懷(care)的載體。以色列曾有一個軍官因承認記不起一個陣亡下屬的名字，要公開懺悔，因為這種遺忘等如抹煞了逝者作為人類群體一份子的身份。六四死難學生之中，有一些是國家一孩政策下的獨生子女，這些早夭的年輕人沒有子嗣，同胞國人若不緬懷他們的面孔名字，他們的故事將無人記起。

在神學上，德國天主教神學家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提出，由於整個基督信仰建基於主耶穌的受難紀念(memoria passionis)，信徒不應忘記世人的苦難。作為打破日常生活秩序的宗教禮儀，每次基督徒在聖餐中紀念耶穌受難，不是將懦弱被動的苦難昇華，卻在顛覆用人血當胭脂粉飾而成的官方歷史，將受難者的聲音從政治權勢的掩蓋壓抑中釋放出來。基督徒對苦難的回憶是危險的(dangerous memory of past suffering for the future)，過去不再是無關現在的「既成事實」，反而是對終極的盼望(eschatological hope)、對未來的敞開，因為那些被歷史淹沒遺忘、無名無姓死去的人，他們在上主的懷抱中尚有未曾實現的價值和可能。死者未圓的夢想、落空的盼望、無聲的痛苦，都有上主的記念，不為倖存者/勝利者的意志而轉移。復活的主雙手上的釘痕仍在，引證上主永不忘記苦難。

苦難的真實存在暴露了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歷史進步觀的虛假承諾——「為了所有人的將來，部分人的犧牲是值得的」。默茨卻相信，為社會進步而付出的人命代價，並非人類歷史損益帳上可以一筆勾銷的「經常性開支」。在極權管治之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確**是用人命換取回來的；即使在所謂民主制度，過去的已經成為過去，只爭朝夕，將來由下一次選舉大多數人的意向定奪。當不少人主張，要「客觀」評價六四，必需同時珍惜過去二十年中國來之不易的驕人成就、安定團結，且要展望未來更好的輝煌日子，他們講的不是「謊言」，而是片面的「真相」，諷刺地掀開了文明面紗背後的野蠻面目，原來和平秩序是建築在權勢暴力和

他者的受苦犧牲之上！每年六四，香港人都集體地遭受一次「道德勒索」：要麼見利忘義、要麼承擔後果。我們享受的所謂「自由」，頭上其實有一把刀！當日大祭司該亞法豈不是也因為「顧全大局」，為避免血腥鎮壓、生靈塗炭，主動將耶穌交給羅馬人發落(約11：47-53)？今日當權者勸我們埋沒良知，以換取國泰民安，是含蓄的死亡威脅，暗示我們以為歌舞昇平的生活，實質是雖生猶死。耶穌指示的生命道路卻是：貪生怕死之徒不能享永遠的生命(約12：25)，基督徒赴死的勇氣是主動求為別人而受苦、為別人而死的真自由。

基督徒紀念六四，不需將犧牲的天安門學生看成民主運動中求仁得仁的「烈士」，他們是在國家頒布戒嚴令之下、軍隊動用「合法」、「極端」武力的受難者。我們不聖化學生領袖，就不介意有人抹黑他們的人格操守；不無條件地將1989年春夏之間發生所有台前幕後的事情定性為轟轟烈烈的反貪腐、爭民主運動，就不怕有人發掘外國勢力介入、中共內部鬥爭的證據為歷史翻案。我們紀念的不單是死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既有北京無辜的平民百姓，也有盲目執行上級命令而喪生的年輕士兵。

基督徒紀念六四的態度也不是節哀順變、互相告慰，更不是憶苦思甜、為當下擁有的感恩慶祝。因為悼念死者以外，還要為仍在受苦的家屬、身心殘障者、困於牢獄者、落難去國者等祈禱爭取。我們悼念六四也不需要與爭取「平反」劃上等號，彷彿他日「平反」之後就可以「了結」一切、不再記念。基督徒不做善忘的教會，只是拒絕

做屠夫的共犯「再謀殺」受害者一次。社會(甚至教會)一些機會主義者認為紀念六四不合時宜、不切實際，「平反」未到最佳時機、應留待將來的公論，他們不相信上主掌管歷史、鑑別善惡，也看不到公義滿盈、「時候將到」(約4：23；5：25；16：32)。伸張正義，就是要在沒有人肯挺身而出的時候主持公道，不是等真理戰勝謊言才出來邀功。

香港基督徒堅持紀念六四，還因為對祖國人民的盼望；不是放不低對執政者的仇恨，而是呼喚他們的良心。朱牧清楚記得1989年6月4日，參加跑馬地的「黑色大靜坐」，他跟身旁的馮可立(時任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相擁痛哭。馮可立問他：「牧師，上帝在哪裡？」朱牧當時指指集會的數十萬市民：「上帝就在這裡！」教會原是受託將世人領向上主、見證天國，但其實上主藉著世人不斷向我們顯現。朱牧說：「如果我哋見唔到人爭取公義，依個世界先至可怕。而盼望就是在極艱難的時候，我們是否與人同行。沉默就沒有盼望、就是等待死亡。」

真相與復和

近年開始有海外的民運領袖、國內學者、本地教牧等提出「社會和解」的概念，為中國的「和平演變」尋找出路，包括《河殤》撰稿人之一、現已成為知名佈道家的遠志明，以及著名異見人士戴晴等。

戴晴2月接受《亞洲週刊》訪問，認為「平反」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行為：「首先是不平等，你是統治者，我是被統治者，我懇求你為我平反；你可能不理我，可能不理我。二是不公正，不是依法行政。沒有標準，想給誰平反就給誰平反。

平反往往是統治者的策略。權利被侵害的公民要的，不是策略，而是法理與法治運行。」對「平反」口號持異議的，還有前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發言人韓東方，他最近接受本港報章訪問時也稱：「不是共黨不平反，六四就沒有價值，你就不能抬起頭做人。」戴晴相信：「共產黨是獨裁者，但懇請它平反無助社會前進，中國問題並非推翻它就解決得了」，所以呼籲借鑒南非「真相與復和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模式，要求對每個個案追查真相、分清責任。

過去幾十年來，世界上已經有超過二十個類似的「真相與復和委員會」成立，除了南非之外，還包括阿根廷、智利等中南美國家，大部分是由過渡政府主導，以調查前政權侵犯人權的暴行，其成績毀譽參半。南非的經驗特別受注目，其中原因是她的理念和運作充滿基督教元素，擔任委員會主席的南非聖公會杜圖主教(Bishop Desmond Tutu)更不時在教堂裡進行的聆訊過程中加入祈禱唱詩。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白人政府交出政權後，南非有鑑於二次大戰紐倫堡大審判(Nuremberg Trials)一面倒以勝利者的姿態對待德國納粹戰犯，無助實踐公義、為德國人民和戰爭受難者治療傷口，所以採取「真相與復和委員會」的半法律程序，讓黑人白人雙方的受害者也有機會伸冤，加害者有機會在尋求特赦的過程中交代真相，也是一種政治妥協、保障成功民主過渡。

委員會自1995年成立至1998年完成報告，一直飽受批評和誤解。有人認為委員會原意是讓受害者和家屬公開訴說他們的

苦難，達到治療的效果，但作證過程中即時傳譯的「失真」，卻將來自不同種族的證人和聽眾的距離拉開；另一方面，由於沒有當場對質和交叉檢驗證供的步驟，委員會有聽信一面之詞之嫌。有民意調查發現，南非百姓不少也覺得委員會偏幫加害者，鼓勵他們為求脫身而出庭，讓他們輕易逍遙法外。然而，事實上特赦申請人之中只有八百多人成功，五千多人被拒。委員會批出的是嚴肅的特赦(amnesty)，不是隨便的免責(impunity)，有明文規定的準則決定是否特赦個別人士；例如，所犯罪行的嚴重性是否與背後的政治意圖「相稱」(proportional)。委員會的工作並非只有寬恕、沒有審判，但首要是受害人要獲得被公眾聆聽的機會，令他們的苦難得到國家的尊重。至於社會整體(尤其是黑人和白人社群之間)是否因個人之間的寬恕得到真正的和解平安，的確是委員會留給所有關心的人的一大疑問。

對南非「真相與復和委員會」模式最尖銳的批評，是徹底否定它體現的價值：批評者認為復和(reconciliation)不是公義的替代品，反而公義是復和的先決條件，不能為了復和而出賣公義。的確，從一開始「公義」便不是委員會的目標，或者它最多是追求恢復性的公義(restorative justice)，卻不會產生一般人期待的報復性公義(retributive justice)。委員會只需請求特赦的加害者交出真相(truth)，而不是要他們用真誠懺悔(repentance)交換寬恕。然而，在當今的「後現代世界」，連猶太人在二次大戰被屠殺的史實也有學者嚴肅地否認，要鉅細無遺地掌握一件錯綜複雜的歷史事實，談何容易？誰有權力詮釋歷史、誰就主宰未

來，歷史修正主義是永遠存在的，甚至在尋求真相的過程中必須被包容。委員會尋求「真相」充其量也只是手段，真正的目標是「復和」。委員會簡單的信念是：讓一個個類似卻又獨特、混亂無章但又有血有肉的口述故事公諸於世，是防止集體失憶的最佳保險。委員會尋找真相不是要為國家加添「歷史知識」，而是要鼓勵社會的同情共感，不輕視歷史的沉重。**加害者和受害者要得到治療就必須經歷痛楚；前者的痛楚是發現後者要負擔更大痛楚，他們才能得到寬恕！**

寬恕和公義

南非「真相與復和委員會」的工作並非是完美的，其他國家也不能照搬，但絕對是勇敢的嘗試。人與上主「和好」(katallagē)是保羅書信裡面的重要神學概念(羅5:10;林後5:18-19)，「復和」在政治上的應用，更值得同樣背負歷史傷痛的中國基督徒探討。

生於克羅地亞的美籍神學家沃弗(Miroslav Volf)，對種族宗教仇恨有切膚之痛。他著名的「擁抱神學」(theology of embrace)起始於一個信念：**假如正義是寬恕和解的前提的話，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將難免無日無之。**公義的追求往往利用不公義的手段，是以「正義」之名進行的報復。沃弗發現路加福音(15:11-32)「浪子回頭」的比喻中，父親主動跑出去擁抱歸來的小兒子、無條件的張開雙臂，就像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張開雙臂迎接世上的罪人。大兒子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德律思維，不但拒絕接納弟弟，甚至不滿父親輕易地原諒弟弟的過犯，覺得這樣對他

「不公道」。沃弗卻認為，故事中的父親並非如大兒子想像中漠視公平原則，小兒子將分得的產業花光已經「罪有應得」，父親沒有再補償小兒子甚麼，只是重新承認他是家族成員的身份(reinstated)，父親其餘全部的家財最終將會由大兒子繼承。父親對兩個兒子的愛不分彼此，他寬恕的行為既成全了律法，也超越了律法，但這卻是眼中只有公道、沒有恩典的大兒子最不能接受的！

保羅在羅馬書(15:7)說：「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上帝」，就是要基督徒活得像基督(Christ-like)。沃弗提出的問題是：人的天性排斥得罪自己的人，但基督信仰講的是「罪人稱義」，主耶穌的血是為那些拒絕上主的罪人而流，基督徒能否真的愛我們的敵人？當沃弗自己被問到他能否擁抱殺害他同胞的塞爾維亞士兵，他的答覆是：我不能夠，但作為基督徒我應該可以。(I can't; but as a follower of Jesus Christ I ought to be able to.)很多人誤解沃弗，甚至將他講的擁抱寬恕，變成一種站在道德高地的廉價恩典。但沃弗深知道寬恕的困難：要將得罪自己的人重新看成為跟自己一樣有父有母，是神所愛的人、不是野獸魔鬼，是一種痛苦的捨己之愛(self-giving love)；沃弗更強調，在現實中，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所以受害者也要尋求寬恕。

沃弗探討的不是關於寬恕的道德責任或心理健康問題，是我、他者、上主之間關係的神學和政治問題。**他意圖勾畫出「寬恕的意志」(will to forgive)的神學**

素描，從這個側影更清楚看見上主的恩典是絕對地無條件的。沒有認罪，何來寬恕？無疑寬恕和擁抱一樣，不能是單方面的，但總是**先有了擁抱的意志，擁抱才能發生**；在這個意義上，寬恕是不講先決條件的。沃弗點出的是哲學上所謂寬恕的「疑難性」(aporetic)：只有「不容饒恕」(unforgivable)的罪行才真正需要寬恕！

「平反」的盼望

基督徒宣揚恕道，必須認清楚一個事實：**放棄追究是受害者的特權，寬恕要出自他們的心和口，別人不能代勞。**沃弗作為前南斯拉夫民族內戰中的當事人之一，從神學聖經反思寬恕對基督徒的意義，不但無可非議，甚至是再合適不過的。

去年四川大地震之後，內地作家余秋雨在網誌上發表〈含淚勸告請願災民〉，指賑災工作向世人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希望那些急於追究「豆腐渣工程」的父母「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勿為反華勢力製造攻擊國家的口實。余秋雨語重心長地勸死難者家屬，應該讓政府先集中精神善後。今年5月11日余秋雨再發表〈向香港請假——答林汐先生〉繼續為自己辯護，認為當日「跪著的家長需要立即獲得精神救助、心理干預」，所以他做對了。他如此形容四川大地震：「在中國文化幾千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時一地把“生命”、“大愛”、“至善”、“以人為本”這些最重大的人文命題凸現得那麼鮮明，並由億萬民眾一起投入實踐。」在「河蟹(和諧)橫行」的大陸，余秋雨的言論絕對「政治正確」。近年流行「正向思

維」的香港基督徒，因「大愛、至善」這幾個似曾相識、似是而非的概念而為之動容者，恐怕也數不在少。然而，公義的伸張或可暫緩一時，卻不可被無限押後。**在地震一周年，連傷亡數字也不明不白的時候，提早宣布人道精神的道德勝利、人民在國家領導下克服天然災難，就是對死難者家屬缺乏同理心。當天安門母親連人身自由也受壓迫的時候，抽象的講單方面的、不對等的「和解」，也是在她們的傷口上撒鹽。**

我們提出真相與復和必須經過一個公正合法的「過程」的重要性作為討論，不是要取代「平反六四」的政治訴求，而是充實它，使之更具體化。華叔最近公開講過，可能要等到13年後(即2022年)才能平反六四。因為到時剛好是胡溫之後的隔代中共領導人再換班，「平反六四」或會成為某一派當權者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華叔接受本刊訪問時澄清，他提的只是其中一個「由上而下」的可能性，在未來的日子「或者還有其他新的事件發生，這樣在民間積聚的力量會更加壯大，來配合上面的人，進行平反。」

隨著1989年當日在位掌權的人相繼離世，假如「平反六四」變成拿一些業已作古的領導人當代罪羔羊，六四能否得到公平的處理、真相大白，將令人憂慮；假如爭取「平反六四」的努力落得如此下場，也將會是對六四受害者另一次的背叛侮辱。**現在我們強調「平反」應以真相與復和為目標，是堅持「平反」必須有受害者家屬的直接參與，程序應盡量公開透明，並以他們個別的苦難為焦點重心，反對籠**

統的、息事寧人的、領導人說了算的所謂

「平反」。這個建議是有感於中國歷史上每次改朝換代，都不免經過清算死人生人的政治鬥爭。要擺脫這種「永恆革命」的暴力循環，就要警惕不讓「平反六四」被某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利用，成為他們的政治籌碼。這方面，我們可以向台灣基督徒帶頭突破政治禁忌推動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將「政治平反」擴闊到「人道關懷」的經驗借鏡。其中《曠野》雜誌、雅歌出版社創辦人蘇南洲，長期關顧受難者家屬，協助他們組成團契，為他們爭取發言權、撫平傷痛、恢復他們的尊嚴和主體性，並對國台語教會不斷敦促提醒，對綠藍兩營意圖騎劫二二八無畏鞭撻，就是希望盡力將二二八「去政治化」，不願見民眾「消費」二二八悲情。

提出真相與復和，不是假仁假義用道德勸說天安門母親克制仇恨、學習寬恕。她們多年來爭取的「公佈真相、道歉賠償、司法追究」，正是我們支持的理性和平、非暴力、有理有節的公義訴求。事實上，在政府不承認犯錯的處境下，目前根本不具備「和解」的條件；到將來連受害者家屬也不在人世，也談不上誰「寬恕」誰。但正因如此，或者我們更應及早分辨清楚「平反六四」的正確方向，否則待「平反六四」在掌權的人手上變質已經太遲。

弱者為尊的政治觀

香港教會跟香港市民一樣，是六四慘案的見證人，沒有資格代受害者說忘記或者寬恕；在受害者未曾得到公義之前，我們只能站在他們那一邊。教會自己本身也是弱者，就要懂得跟弱者同行，為他們爭取尊

嚴。每次基督徒以被赦罪人的身份一同擘餅，就是預先「綵排」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記念苦難有無限的政治涵義：在苦難面前，世上一切的權勢被放置於審判台上，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辯護。我們的信仰令紀念六四「再政治化」，為政治注入新的道德想像，就是以弱者為念的政治秩序。

南非推翻種族隔離政策的經驗是，先有著名的《羅斯頓堡宣言》(Rustenburg Declaration)，由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本地教會、曾為政策提供神學辯護的荷蘭改革宗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以及一直保持緘默的五旬宗教會聯署，為自己沒有抵抗罪惡(或做得不夠)公開懺悔。而在台灣，有長老教會與黨外人士要求平反二二八，並為教會過往對受難家屬「視而不見」率先道歉，然後再有國台語教會聯手主動表達關懷。反觀香港，有教會的學生團契在1989年5月20日冒雨參加維園的集會，事後團契團長被牧師訓話，責備他為甚麼不帶團友回教會聚會(雖然在八號風球下根本聚會都已經停止了)。又有堂會在六四之後，牧者對屠城隻字不提，也不准許教會內公開談論，結果一班年青專業基督徒被逼要在主日崇拜開始前向會友派發抗議傳單。在如今香港的政治環境，紀念六四所付的代價比起國內的同胞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教會處身安全的距離，更要提防自己由昨日不發一言的旁觀者，變成今日冷血的共謀者、明日的歷史罪人。

華叔認為支持爭取平反六四，教會責無旁貸：「有些教會至今仍未有對六四事件表過態。首先就要反省這事，究竟你對六四事件，有何看法？這是最重要。假如

你都是非不分，可以叫你做甚麼事呢？其次，教導自己的教友去認識這事，參與這事。其實，我對他們的要求不高，我們並沒有要他們參加支聯會的工作，但最低限度可以參加遊行、燭光集會。」華叔明白有信徒害怕參加政治集會、示威遊行，抗拒主辦單位一些政治口號，他坦言：「以前我也不習慣叫口號，叫的時候，好似很尷尬，但慢慢地自己就會習慣。」華叔引用路加福音八章6-18節：「我們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認識，為甚麼不像燈一樣放在枱上給人家看呢？你怕甚麼？」華叔又引耶利米書十三章23節：「六四給我自己的最大教訓是認識到共產黨的本質。它是絕對的權力，不容許任何挑戰它的權力。它是殘暴的，它是欺騙、滿口大話的。」所以他解釋「結束一黨專政」這個口號並不敏感：「因為『專政』是不好的東西嘛，我們沒有叫『打倒』，只喊『結束』而已。我們這個已是很溫和的字眼了。是吧？！」

可是，香港回歸後的政教關係越來越受人關注，華叔甚至認為教會不是跟權力走近了，更準確是：「從來都是這樣！以前是跟香港權力走近，現在是跟國內權力走近。」歷任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基督教協進會義務總幹事等崗位的李鼎新牧師，便曾撰文指香港出現「非神聖聯盟」：「宗教、商家和政治的結合愈來愈明顯，彼此合作無間，這是前所難見的」。現於英國過退休生活的李牧師仍然心繫六四，他對本刊表示，很可惜今年不能跟李師母一同參加維園晚會。按他分析，教會對六四的態度不是單純的政治忌諱：「我想是部分人，隨著時間，逐漸淡出」

，但教會領袖有更多利益的考慮：「每個人與每個機構亦會不同，簡單來說，就是『名』與『利』。對宗派來說，大前題是宣教使命可以拓闊很多，方便很多。……有一批人淡了，而又有另一批人改變自己的立場。有些以前不談政治的，但如今卻做了政治動物。」李牧師呼籲教會要站穩信仰立場：「我想現代文化及社會風氣皆鼓吹要做個成功的人，要大、要有權、要大家都知道你是何許人，這一切都是極大的吸引。我自己覺得耶穌不是要你做這樣的人，所以他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

母親的抉擇

基督徒屬靈生命實踐和神學省思不可分割，否則空有激情、卻沒有行動方向；但社會工程手段與目標的計算，同樣容易令人迷失於政治妥協之中。神學提供的「答案」畢竟有時弊在太「整齊乾淨」，道理說到盡頭便沒有靈性呼吸迴旋的空間，容不下矛盾軟弱，也將人尋求上主的掙扎曲折輕輕帶過。我們還需不時令智慧休息，讓路給不可收拾的情感；噩夢中驚醒的孩子要在母親的懷中盡情哭泣，才能釋放對邪惡黑暗的恐懼不安。相反，對六四，也不能只剩一年一次、自我陶醉的悲情。

一位曾任職新聞界多年的女傳道接受本刊訪問，由於她參與不少國內事工，經常往返中港兩地，希望能保持低調不以真實姓名示人。從她的個人體驗和牧養經歷，或者我們能學習到一點與六四回憶共同生活的方法。她的處境也反映了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既要爭取服事國內同胞和信徒的機會，又不在信仰人格上妥協、與當權者做政治交易，所要承擔的道德危機

之大，不同於教會內那些自以為能夠「左右逢源」的一時俊傑。

由於從事新聞工作的關係，她在1989年北京發生屠城之後幾個月便有機會第一次踏足天安門，此後幾乎每次到北京公幹，都會想方設法在早午晚不同時段到天安門走一趟。當記者的幾年裡面，她親眼見證國家驚天動地的改變和國力的起飛，所以她認為香港一些立法會議員錯過了第一身認識中國的機會，是非常可惜的。她說，國家仍有很多不足之處、屢屢犯上嚴重的錯失，但我們不能否認無論領導人或國民的質素都在不斷進步，同時肯定國家的好與壞並無矛盾，只會令我們更投入貢獻國家。她形容自己跟國家的感情像八十年代傷痕文學中的「苦戀」；同樣地，她對六四的執著也是非常複雜的。大概十多年前她蒙上主呼召全職事奉，但偏偏她在牧養上特別刻意不提六四或其他政治課題，因為不想將個人立場和政治意識灌輸給會友，反而盡力帶領弟兄姊妹關心更廣泛的中國議題(例如公平貿易、城鄉的貧富懸殊等)。直至今年復活節前後，她唯一一次在崇拜講道中提到天安門母親：「因為是二十周年，覺得不能不講，其實本來應該多講一點，雖然不需要年年講。我過往不講不是因為教會有甚麼制肘，只是我自

己的選擇。」

在個人的生活上，她卻從來沒有「放低」六四的「包袱」，也不覺得有此需要，因為日常中本來沒有太多空間談論六四：「那些不斷掙扎是否應該記憶六四的人，其實心裡等於很想忘記！」她自言二十年來每逢六四當日都會穿黑色衣衫，參加維園晚會亦已經變成近乎一種禮儀，由於集會能夠差不多保持多年來同一的地點、形式、音樂、甚至台上的人物，所以帶有強烈的宗教性，讓人自由和真誠地重拾內心對六四的百般情感。但她承認人老了，已經不再激情，「唔夠力氣喊『平反六四』」這類政治口號，儘管她期待平反的一日，但彷彿又知道不能在未來兩三年實現。對六四的感情已慢慢轉化成一種生活點滴中的「耐力」。

二十年前剛畢業的大學生，今天已經身為人母。雖然兒子不足十歲，她仍嘗試跟他講當年六四發生的事情，「但係佢唔明士兵點解會殺害大學生哥哥姐姐，細路仔最鍾意問點解」。或者對待國家民族，也要如母親一般的耐性、耐心。在殘酷的歷史面前，成年人也會驀然失語，只能俯首默禱，讓上主向我們說話：「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太5：4)。

總編輯：葉菁華 副總編輯：禰智偉 執行編輯：鄧美美
設計：許仲瑜 承印：瀚林智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使命實踐支援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本刊旨在盡量提供各種資訊及多方面意見，供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參考，其內容不代表崇基學院神學院立場。